

新华社
周恩来。周
新华社

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上接第一版)

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遍查医书，找不到用狗血淋头或打棍子这种专治“健忘症”的秘方。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明明是政治手法，那里是什么治病的药方？

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

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可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們伟大的党。他要我們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們党下台。

在当时，叫嚣要我們党下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同时又刮起了一股单干风、翻案风。就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我們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股逆流闹得最凶的时刻，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了邓拓这篇恶毒的文章，叫喊要我們党下台。

你看，站在党内的邓拓，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配合得多么密切！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古讽今地说，“王道”就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办事，“霸道”就是“依靠权势，蛮横强逼”，说“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从这里找出经验教训”，并且骂我們“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很显然，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所说的“王道”“霸道”，都是剥削阶级对人民的专政。“王道”和“霸道”是他们统治人民的两手。他们所宣扬的什么“王道”，只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欺骗。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之后，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依靠权势”，即依靠国家机器和广大工农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在这个情况下，邓拓气势汹汹地反对“霸道”，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把邓拓的上述言论，同赫鲁晓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论加以对照，他的反动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赫鲁晓修正主义者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则说什么是“东风”、“西风”都是“陈词滥调”。

赫鲁晓修正主义者污蔑我們“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用空洞的咒文、响亮辞句和挥舞马粪棍做的剑”；邓拓则说，“东风”是“恶人”、“西风”是“敌人”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空话。

赫鲁晓修正主义者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口号，来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and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故视群众，更不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智慧”的邓拓，竟然狂妄地说我們党“凭着自己的明智”，“不重视群众的智慧”。这不过是重复赫鲁晓修正主义者污蔑我們的恶调，配合赫鲁晓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颠覆活动。

国内外敌人对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采取和平演变的手段，企图实行反革命复辟；而邓拓则要我们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要我們党“完全休息”，一切由他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

邓拓是赫鲁晓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邓拓所讲的，就是赫鲁晓修正主义者所讲的恶调，就是赫鲁晓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蚍蜉撼大树，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邓拓用所谓讲故事的手法，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黄金和宝物的骗局》、《说大国的故事》、《今年的春节》、《白开水最好喝》等杂文中，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讲了两个外国寓言故事。一个是竞技比赛好说话，一个是山雀啄鸟口，要把海水烧开。

与《两则外国寓言》同时，邓拓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射来一支毒箭：《一个鸡蛋的传说》。这篇杂文材料是从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上抄来的。故事是讲，有一个入全部的家当只有一个捡来的鸡蛋，这个人幻想鸡蛋生鸡，鸡生蛋，卖鸡买牛，牛再生牛，翻几番，最后还打算讨小老婆。结果引起他老婆的“勃然大怒”，“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邓拓讲了这个故事之后，问道：“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邓拓接着说：这个人虽然懂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想入非非”，以致“这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在这所谓的“故事”中，邓拓讲了三个意思：（一）竞技比赛、山雀、只有一个鸡蛋的人，他们的“伟大计划”都是“胡吹牛皮”；（二）他们夸大了“心理要素”的作用，自以为凭着“心理要素”就可以“有所作为”，结果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破产”，“完蛋”了；（三）牛皮吹破以后，“受骗的人们”不要“轻易地放走吹牛皮的骗子”。

在这里，邓拓真的是讲故事吗？不是。从杂言故事，就是有意所高的。江盈科讲的那个故事的目的就叫《妄心》，是讽刺那些“世之妄意早计，图非图者”，即讽刺那些希望早一点、快一点实现自己目的的人。邓拓也在文章中反复启发读者，要懂得这些故事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你有一反三思的理解力”，那么，“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可以说说明现在的“许多问题”，“事实显然证明”，“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你并且指着鼻子说：‘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奇口没有？你看见带着汤匙去赴宴的没有？’”你看，邓拓就

是用这种挑战的口吻宣告，他讲的故事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帝国主义曾经嘲笑我们，说我们是“说大话”，是“吹牛皮”。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时，帝国主义者就叫嚷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蛋了”。而邓拓所讲的这些故事，就是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说大话”，是“胡吹牛皮”，是“想入非非”，是“用空想代替了现实”，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把全部家当都“毁掉了”。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赫鲁晓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一条危险的尝试的道路”，是“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遭到了“彻底失败”。邓拓对我们的攻击同赫鲁晓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如出一辙。

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无耻污蔑，我们党早就有力地作了驳斥。我们说：我们用大跃进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打倒了么？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发了原子弹吗？中国出现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不是我们，而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是一个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

应该指出，邓拓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不只是骂骂而已，他气势汹汹地煽动说：“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皮的骗子”，这就是说，他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邓拓自己的说法，他这个政治骗子的面目既已被大家揭破，我们也绝不能再轻易放过去！

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为他们唱赞歌

邓拓上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的言论，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现在已经查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前，邓拓发表了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邓拓是漏网的大右派。一九五九年，他被罢了官，被撤掉了在人民日报担任的重要工作。邓拓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呼冤喊屈，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呼冤喊屈。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忽然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的文章。邓拓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人物”，李三才“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英雄事迹“被埋没”，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对于李三才的所谓不白之冤，邓拓不仅为之万分痛惜，而且讲起来情绪很激动。李三才究竟是何许人，邓拓为什么要替他辨辩？

李三才是明代万历时的一个官僚，经过阳历巡抚、户部尚书等职。他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者鲜血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人民的死敌，根本不是什么“正面人物”。

邓拓所以对已死了几百年的李三才感兴趣，因为他被罢了官。李三才任户部尚书时，想挤入“内阁”，工部郎中部辅丞等奏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利具食、伤、险、横四大罪”。李三才被迫“罢官”，居家时，御史刘光复告他“盗聚私盐建窑”，又引起一场争论。结果李三才“落职（即罢官）为民”。《明史》对李三才的评价是：“才大而好用权术，善结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世以三才为贼”。

《明史》作者完全是用替李三才辩护的口气来写的。因此，从史书上说，李三才没有不白之冤，不用不着辩护。可是，邓拓却为李三才愤愤不平，要替他翻案。他说，“李三才又一再翻案，……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肯彻底追查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吗？”

李三才“盗盐米”的事，《明史》记载是经过查究属实，并且把李三才“落职为民”。奇怪的是，邓拓在写这篇文章时，火气却那么火，他不顾《明史》记载，添枝加叶，故作波谲，硬说李三才“是理直气壮的”，而朝廷方面“却不彻底追查李三才”。

问题的真相如何，确实很明白：邓拓笔下的这位“李三才”，就是“海忠介”即“海瑞”，就是被我们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所以把那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说成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所说的“理直气壮”，就是所谓反党骨气。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人民面前，在党面前，是有罪的，他们不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邓拓还写了《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文章开头的一首诗是一九六一年写的，其中四句是：“一文画笔秋毫；十道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水墨是生平。”全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郑板桥“乌纱帽”。他翻来覆去说“罢官”、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统治阶级“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的诬告”，终于使“郑板桥弃官而去”，“罢官以后”的他的思想作风“越来越鲜明”。

邓拓还引了郑板桥题在自己画的《深山兰竹图》上的一首诗：“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竿。一项乌纱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并说，这幅画是他不愿做官的时候画的，如果“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国家所经历过的官僚生活做一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这就是说，《深山兰竹图》的主题思想就是“一项乌纱早脱”，就是“罢官”。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宣传郑板桥在“罢官以后”仍旧不屈服的“傲骨”。

一九六一年，邓拓还为米万钟、李卿的被罢官鸣不平。他说，米万钟是“很有骨气的人”，“为政清廉，

关心民利”，屡评时政，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因此遭到“罢官”。说李卿“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两草科名一贬官”这句诗反映李卿“愤愤不平的心情”。

显然，邓拓是借这些地主阶级的亡灵，抒发自己对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限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当我们党对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的牛鬼蛇神展开反击时，邓拓更借郑板桥的口叫出：“难道不公还恨口，不长许叶一两声”。足见仇恨之深。

邓拓在一九五九年被罢官之后，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与过，无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最喜豪情在，举国高潮望远天。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自己被罢官，对他是怀着强烈的仇恨的。在这首诗里，邓拓顽强地表现自己是为自己辩解，污蔑党没有分清他的“功”、“过”，邓拓的“豪情”，就是反党的“傲骨”，所谓“后争先”，就是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间，邓拓所以大肆颂扬被罢了官而不屈服的“骨气”，一方面是为了同吴晗的《海瑞罢官》互相呼应，密切配合，替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唱赞歌，另一方面，发泄他自己胸中对党的仇恨，为自己闹翻案，向党进攻。

不准滑过去！

邓拓供认，他懂得“瞒天过海”，“借尸还魂”、“浑水摸鱼”、“指桑骂槐”，“假痴不癫”，“笑里藏刀”，“无中生有”，“十面埋伏”，“虚张声势”等等“阴谋诡计”。他知道赤膊上阵是“危险”的，因此，他总是“披挂上阵”。在他认为时机有利时，就狼狠进攻，在他认为时机不利时，就准备滑过去。邓拓和他们“三家村”的“兄弟們”，确是一伙政治阴谋家。

邓拓这一伙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他们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进行斗争。

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吴晗，放出了大毒草《海瑞罢官》，恶毒地咒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又放出了另一株大毒草《论海瑞》。为了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翻案进攻，一九六一年初，吴晗“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大毒箭《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家村”的主将邓拓“上马”，《燕山夜话》上台演出了。过了几个月，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同时出台。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邓拓在《神凤楼的季节》杂文中，讲了一段黑话：“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掘下大白菜的种籽，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些白菜苗。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数量。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主将一声令下，就在同年同月，“三家村”黑店“前线”开张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他们取得了“经验”之后，又联合了一批“园艺爱好者”，撒下了另一批“晚葱”——“长短录”。

一时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夏衍等人，串通一气，结为一伙，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开辟专栏，称兄道弟，说长论短，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利用监督，以为时机已到，狂妄地提出，要我們党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要用棍子把革命者打死。

但是，他们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们党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他早就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教导我们开展反无天价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使人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登了一则广

告，叫《奉告读者》，说是“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明明是因为十中全会之后形势对他们不利，“夜话”才“下马”的，却说什么“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这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一旦时机来到，“非写不可时”，还要再写，“夜话”暂时“下马”，“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揭发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邓拓便匆忙出场，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表面上是批评吴晗，实际上是替吴晗辩护。他们企图混过去。邓拓的这篇文章，是怎样为吴晗辩护的呢？

第一，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继承论”。他装腔作势地说，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结论是道德继承论。他断定，无论是《海瑞罢官》、《海瑞罢官》还是《论海瑞》，他的思想基础都是道德继承论。

第二，回避要害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就是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但是邓拓却闭口不提“罢官”，而且转弯抹角地向读者说明，《海瑞罢官》的主题不是“罢官”。

总之，邓拓的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模糊群众的视线，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且丢给吴晗一个救生圈，告诉吴晗，你的问题主要在道德继承论问题上，对于剥削阶级道德，“决不加以继承，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在这里大作文章，我们就可以避开“要害”，滑过去了。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连忙说：“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接着，他把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中，干脆就用邓拓给他出的救生圈做题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他完全按照邓拓的调子唱歌，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旧道德继承论者”。他说：“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中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是一个”，这就是“道德继承论”，并且说邓拓的批评是“科学的批评”，“我诚恳地接受，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是“贼喊捉贼”的一出双簧戏。

他们从一方面提出了“批评”，一方“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事情就可以过去了，邓拓、吴晗等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是邓拓等预料不到的。他们的这些活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着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今天重读这段话，是多么的亲切呵！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助，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着一整套进退应策策略的。

这说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异常尖锐的你死活的阶级斗争，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他们这一次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他们神气活现，只要把他们放在太阳底下照一照，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他们就垮台了。

既然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已经暴露，画皮已经撕破，手法已经戳穿，我们就一定要穷追到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斗争，敢于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引导着我们胜利前进。

阴险毒辣的反党“药方”

“自食其言”“言而无信”是骂人的字眼，根本不成其为症状。从邓拓举出的医书上，也根本找不到他所说的医根“健忘症”的药方。邓拓编造的药方是“政治药方”。他企图把共产党打下台，改变我们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让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国家变颜色！我们一定要把邓拓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高明的医师”彻底清除掉。

上海中医学院伤寒温病教研组助教 柯雪帆 刘嘉湘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中《专治“健忘症”》一文尤为恶毒，是邓拓怀着刻骨的仇恨，向我們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起的一支毒箭。奇怪得很，《前线》杂志编辑组在一九六一年二月给戚益同志的信中却把邓拓“压制批评，说什么‘作者写这篇杂文，就是讲故事，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和知识’（见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光明日报》）真是恶毒无耻到极点！”“专治‘健忘症’”是讲故事吗？还是介绍医学知识呢？不妨拆开来看一看。

我们是中医，平时在临床上所看到的“健忘症”只有失眠、疲瘦、腰膝等症状，所谓“自食其言”、“言而无信”、“丧失信义”、“不堪信任”等字明都是骂人的黑话，根本不成其为症状，明明是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文子后语》根本不是一本医书。《中国丛书集成》把它列入小说类，有人把它收入《历代笑话集》。《文子后语》的作者陆佃自己在序言中说：“世皆知文子为被谗放逐，而不知其有作为也。……越谗放逐，好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可见《文子后语》是一本政治讽刺小品文，哪里谈得上记载了“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邓拓还摆出了“学董”的样子，摘引了《圣惠方》、《医统》、《素问》等中国古代医书中的材料，企图欺蒙读者。可是，他的手法拙劣，狐狸尾巴拖得很长。医学史上从来没有健忘会发展为疯狂、发展成为傻子的论述。我们翻遍《灵

枢》全文，也没有健忘症“两极化”的记载。明代根本没有《圣惠方》这本书记，我们翻遍了宋代《圣惠方》，也没有“巴戟天丸”和“丹参饮子”这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主要是化痰清心的药物。显然，邓拓开出这些药方是“政治药方”，是影射我们党的，把我们党比作痰涎心窍、神志不清的病人来毒骂。

邓拓借治病为名，发泄它对党的切齿仇恨，要用一些“药”，把“病人”的头上下下去，用一根特殊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仇恨和毒骂我們党的语言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一棍子打死。这是多么恶毒的毒计！这还不够，邓拓在文章的结尾处又写下“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所谓“高明的医师”，就是把共产党打下台以后，由邓拓他们那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上台，一切听从他们的摆布，按照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办事，改变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国家变颜色！这是一帖何等毒辣的“药方”啊！

有毒草就得把它彻底铲除。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擦亮自己的眼睛，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不安全隐患，决不收兵！

(原载五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鋤
草
集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编辑同志：
看了你报五月十一日发表的《评“三家村”》的文章，我们进一步认清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革新本质，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将师三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中，是怎样彼此呼应，互相掩护，狼狈为奸的。
在这封信中，我要揭露在《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不久，邓拓写过的一篇“谈淡经营”的黑话，使它公诸于众，以便“寄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那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全国各大报刊全面开展了对《海瑞罢官》这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批判之后，吴晗的问题，眼看就要揭盖子了。伙计挨打，掌哪能袖手旁观呢？于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邓拓以《北京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在中共北京市委一楼南侧会议室，召开了一次讨论《海瑞罢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北京市中学部分领导干部、语文政治历史教师以及教学业务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十几人。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拓妄加捏造，以市委领导与学术界前辈自居，发表了一篇恶毒的黑话。这篇黑话，篇幅虽然不长，但枪刺指向的方面，却相当广泛。举其大端如下：

为《海瑞罢官》辩护，替吴晗开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邓拓说：“姚文元同志发表了对于《海瑞罢官》批评的文章，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实际上，这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用什么观点、思想指导戏剧创作的问题”。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海瑞罢官》是射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为首的党中央的一枝毒箭，是“三家村”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所提出的一块污蔑石。因此，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就不能不是我们国家阶级斗争中的重大事件。

邓拓把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如此偷梁换柱，不过是想转移对《海瑞罢官》的目标，改变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性。邓拓自作聪明，玩弄多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偷梁换柱的伎俩，想以此障人耳目。其实，他确能瞒住了谁呢？正好暴露了他自己的狐狸尾巴。

吴晗在他臭名昭彰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曾写：“我确实是形式地看问题，好就是绝对好吗？一切皆好吗？就没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就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吴晗的这段话，并非独创，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邓拓在座谈会上早就说过：“对海瑞的评价，不能说他好，就都好，说他完全代表农民、市民，这就缺乏辩证的观点”。

看邓拓、吴晗，他们的计谋多么一致。语言又是那样的吻合，没有密室的精心策划，难道是可能的吗？我们可以看出，邓拓吴晗这个小鬼人，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中，是怎样密切配合、互相关照啊！

邓拓指吴晗的犯错误就是“缺乏辩证的观点”。

好一个“缺乏辩证的观点”！

大放厥词，明目张胆地攻击《文汇报》，含沙射影地攻击《解放军报》

邓拓说，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当中，“要充分讨论，究竟结论怎么样，还得从讨论中看，要把讨论空气活跃起来。这个《文汇报》做得很好呢。《文汇报》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最不应该的是，他们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也登载出来”。《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肯定了《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人家是内部报纸，为什么要公开发表呢？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你这样一写，谁还提不同意见呢？”

邓拓为什么又要攻击《文汇报》呢？为什么要说《文汇报》做得很好呢？一句话，就是因为《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最先组织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刺了谁的肉，谁知道谁疼。拉出他的伙计，在众人面前“抽打”，怎能不引起邓拓的仇恨呢？

他指责《文汇报》不该登《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是因为《解放军报》是“内部报纸”吗？否。邓拓就是力图缩小国旗鲜明的《解放军报》编者按的影响，以便使他的“难友”在学术讨论的幌子下，遮天蔽日，解装之意不在酒啊！

邓拓为什么这样害怕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呢？正如他自己也在会上所说，因为“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你这样一写，谁还提不同意见呢？”因为“你这样一写”，“各种不同意见”就不好公开发表，学术界空气就活跃不起来。”“任何人都是一概而论，一种结论，就没事了。”

在邓拓看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才算学术界空气活跃，“杂家大显风采”才算“有意思”。而《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正象一股强劲的东风，把邓拓埋藏的肥皂沫吹成个粉碎。因此，他怎能不含沙射影地攻击《解放军报》呢？

事实昭然，有目共睹。邓拓这条毒蛇怎么掩藏得了呢？同志们，索性低头，不要握手，狠狠打吧。

时至今日，《海瑞罢官》的原形暴露了。“三家村”黑店破获了。邓掌柜，你是不会患“健忘症”的，黑店开张以来，你们合伙经营的这笔罪恶买卖，难道还不“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么？老实告诉你，办不到！你亲手的罪恶勾当，你的黑手已经被人民抓住了。你们合伙经营的“合同”也被人民撕毁了。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偷了毒草好肥田。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彻底搞掉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线。不论你们黑店的那个掌柜、先生、伙计，不论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我们要统统按出去，叫全国人民在光天化日之下，认清你们丑恶的嘴脸，永远不再上你们的当！

文章第二段，放下中农指出：“吴晗同赫鲁晓夫是一个立场”。这是一针见血地刺到了吴晗的要害。但是，《北京日报》也采取了挖心战术，将它挖掉了。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你们和吴晗是同病相怜的，怕你们自己的罪恶勾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仅摘录了以上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几点，但是已足说明《北京日报》的手法是多么卑劣！我们要正告你们，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与广大工农兵群众一道，一定能够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揪出来。你们再执迷不悟，人民是不能答应的。

任何花招欺骗不了我们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重新发表了“三家村”黑店伙计的一些材料，并且加了一个掩护他们的编者按。尽管编者按和那些材料是经过精心编制的，但它在群众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的眼睛，我们广大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看了编者按和材料后，非常气愤，纷纷给报社写信，一针见血地向邓拓伙计的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是“伪装打扮，射出刀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县河北邢台地委局干部写信文章说：邓拓的“伟大的文章”、“一个鸡蛋的买卖”等文章，借用一些古代的故事和外国的寓言，对我们党的三面红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伟大的谈话”、“以幻想代替现实”，是“吹牛皮”。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大紫草坞公铁堡堡在座谈会上指出：邓拓在《欢迎“杂家”》一文当中，说“杂家”，是一件什么人的呢？邓拓的意思很恶毒，就是吴晗搞这一类“杂”。

他名叫“杂家”，好象没有反阶级性，实际上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的政治家，不过是用“杂家”这个招牌来混淆是非，毒害麻痹人民。他们这样死命的吹捧“杂家”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这一类“杂家”去领导“斗”，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复辟。

邓拓这伙人招摇和平常演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眼中钉。他在《王道和霸道》一文中，拐弯抹角地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要恢复到封建帝王的“王道”。大家四月十四日起就批驳《北京日报》骂嘴话，寄去读者们的记录和文章。邓拓“三家村”黑店伙计，特别把邓拓伙计的恶毒攻击，批驳了二十多次，这些稿件和材料，一直被《北京日报》扣压起来，置之不理。在这期间，《北京日报》也没有发表其他地方工农兵群众批判邓拓的文章，更没有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们要质问《北京日报》：你们口口声声要“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无情的批判”，为什么对工农兵群众揭发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的稿件一字不发？这只能说明，你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勾当；说明你们到现在还在充当邓拓伙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忠实地为他们服务。五月九日，你们转载了《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批判你们的文章，并表示“不管这些错误的性质多么严重，我们一定要坚决改正”。真是是假，我们拭目以待。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的眼睛雪亮，任何花招都欺骗不了。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都逃不过工农兵群众的批判、斗争，一切毒草都必须连根彻底铲除！

《海瑞骂皇帝》的孝生兄弟

邓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中国历史博物馆 王宏向

吴晗在报纸上抛出了罪恶昭彰的《海瑞骂皇帝》，邓拓在历史博物馆中展出了《海瑞揭发了明代的黑暗统治》。通过一条黑线，吹起两股妖风。

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形被揭露以后，大老板来了，大批恶狗来了，你们果然大闹。原来还有一个《海瑞骂皇帝》的孝生兄弟，不但一条毒线，而且一条毒线。这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中的《海瑞揭发了明代的黑暗统治》。

一九五九年夏天，正当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昂首阔步，向着资本主义和残余封建势力猛烈冲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吴晗，怀着刻骨的仇恨，配合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抛出了罪恶昭彰的《海瑞骂皇帝》。恰在这个时候，天安门前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也出现了《海瑞揭发了明代的黑暗统治》。无独有偶，恰巧一辙。难道真是偶然巧合吗？不是，完全是阴谋，经过周密策划，邓拓亲手策划出来的，向你们党、你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把毒刀。这是远在三“三家村”黑店开张以前，邓拓、吴晗这伙恶霸串通一气，互相配合，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罪恶案。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十月，邓拓窃取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的职位。本来，直到一九五九年五月中旬，经过六次修改的陈列大纲中，根本没有提到海瑞。突然，在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出版以前不久，五月十二日，建馆领导小组的一个成员指示：“海瑞应该表现一下”。于是，这个地

《北京日报》安的什么心？

北京大学法律系五年级 卫 兵

我们做好多批判“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文章，寄给《北京日报》。

可是，它们长期扣压下来。发表的一篇，也把重要观点和内容砍掉。这是安的什么心？

文章开头，我们引用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文章接着指出：“吴晗在《海瑞罢官》、《海瑞罢官》两株大毒草中，采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激起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无比愤慨”。但是《北京日报》将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和我们的分析删除了。我们认为，这决不是几句话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按毛主席的这—教导，进行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则问题。我们要问《北京日报》，你们要把这场斗争引向哪里去？

文章第一大段的标题是：“《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就是毒草、反社会主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北京日报》将标题中的“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去掉了。我们要问《北京日报》，你们究竟安的什么心？

文章第二段，放下中农指出：“吴晗同赫鲁晓夫是一个立场”。这是一针见血地刺到了吴晗的要害。但是，《北京日报》也采取了挖心战术，将它挖掉了。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你们和吴晗是同病相怜的，怕你们自己的罪恶勾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仅摘录了以上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几点，但是已足说明《北京日报》的手法是多么卑劣！我们要正告你们，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与广大工农兵群众一道，一定能够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揪出来。你们再执迷不悟，人民是不能答应的。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重新发表了“三家村”黑店伙计的一些材料，并且加了一个掩护他们的编者按。尽管编者按和那些材料是经过精心编制的，但它在群众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的眼睛，我们广大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看了编者按和材料后，非常气愤，纷纷给报社写信，一针见血地向邓拓伙计的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是“伪装打扮，射出刀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县河北邢台地委局干部写信文章说：邓拓的“伟大的文章”、“一个鸡蛋的买卖”等文章，借用一些古代的故事和外国的寓言，对我们党的三面红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伟大的谈话”、“以幻想代替现实”，是“吹牛皮”。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大紫草坞公铁堡堡在座谈会上指出：邓拓在《欢迎“杂家”》一文当中，说“杂家”，是一件什么人的呢？邓拓的意思很恶毒，就是吴晗搞这一类“杂”。

他名叫“杂家”，好象没有反阶级性，实际上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的政治家，不过是用“杂家”这个招牌来混淆是非，毒害麻痹人民。他们这样死命的吹捧“杂家”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这一类“杂家”去领导“斗”，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复辟。

邓拓这伙人招摇和平常演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眼中钉。他在《王道和霸道》一文中，拐弯抹角地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要恢复到封建帝王的“王道”。大家四月十四日起就批驳《北京日报》骂嘴话，寄去读者们的记录和文章。邓拓“三家村”黑店伙计，特别把邓拓伙计的恶毒攻击，批驳了二十多次，这些稿件和材料，一直被《北京日报》扣压起来，置之不理。在这期间，《北京日报》也没有发表其他地方工农兵群众批判邓拓的文章，更没有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们要质问《北京日报》：你们口口声声要“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无情的批判”，为什么对工农兵群众揭发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的稿件一字不发？这只能说明，你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勾当；说明你们到现在还在充当邓拓伙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忠实地为他们服务。五月九日，你们转载了《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批判你们的文章，并表示“不管这些错误的性质多么严重，我们一定要坚决改正”。真是是假，我们拭目以待。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的眼睛雪亮，任何花招都欺骗不了。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都逃不过工农兵群众的批判、斗争，一切毒草都必须连根彻底铲除！

